

● 文学研究

从思想者到行动者的嬗变^{*}

——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和“超人”为例

吴琼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一方面用“以头撞墙”的勇气诘问一系列理性的逻辑:当理性遭遇生活本身,用理性的规律、科学的逻辑、统计学的方法是否能够丈量、计算生活的真理,体验人的本性;另一方面发出个性与自由的呼告:他不惜以病态的呐喊、牙痛般的呻吟体验挑战的快感。而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某种程度上则似乎从地下室走出来,用行动演绎地下室人的理论,真切见证人的利益不能用统计方法计算。但二者在争取自由和个性道路上的态度却一致,拉斯科尔尼科夫从地下室人开启的那扇虚掩的门后走出来,将这种精神发展到极限,从而上演绝对自由的悲剧。本文分析“以头撞墙”的思想者到“举起斧头”的实践者变化的原因,以此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理性、非理性、自由与个性的界限、道德抉择等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 地下室人; 拉斯科尔尼科夫; 理性; 自由; 个性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4)03-0126-5

From a Thinker to an Actor

— Take *The Underground Man* and *Superman* by Dostoevsky for Example

Wu Qio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The “underground man” by Dostoevsky, on the one hand, questions a series of rational logic with the courage of “bumping the head into the wall”: When ration is confronted with life itself, can the reality and truth be evaluated and calculated and the natural instinct be experienced by means of rational regulations, scientific logic, or statistic methods? On the other hand, individuality and liberty have been claimed: he experiences the pleasure of challenge. However, Raskolnikov, to some extent, seems to have stepped out of the underground. He illustrates the theory of the underground man and witnesses that human beings’ benefits cannot be calculated statistically. They both have the same attitude in pursuing liberty and individuality.

Key words: *The Underground Man*; Raskolnikov; rational; freedom; personality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思想”起着核心作用,作为他一生创作的分水岭,《地下室手记》完全可以视为思想性作品。在此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充满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感,致力于对人物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而从《地下室手记》开始,人物的“思想”成为小说主角。这些“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作家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与回应,反映出其一生对哲学与宗教的探索、对人性与灵魂的

拷问。别尔嘉耶夫曾经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主人公就是他本人,是他自己的道路,是他存在的不同面,是他的痛苦、他的拷问、他备受苦难的体验”(别尔嘉耶夫 2008:9)。然而,人物并非是作家的全权代言人,而只是其思想某些层面的见证者与承载者,作家一生的思想复杂而艰深,有时呈现为动态发展,有些问题通过一部作品没有阐释彻底,他便会另一部作品中继续探讨或者用

* 本文系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罗赞诺夫的文学批评思想及诗学特征研究”(13C039)和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项目“罗赞诺夫的文学批评研究”(1253G038)的阶段性成果。

多部作品探讨。因此,仔细阅读作品便会发现,作家不同作品中的主人公构建起一条不断延伸的长廊,彼此互文,某些人物之间甚至相互参照、补充、对话、交锋。《地下室手记》和《罪与罚》正是这样两部具有复合关系的作品,即“一个作品把另一部作品作为基础或者出发点”(琼斯2004:24)。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地下室人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某种层面上具有内在同源性,同时体现为蜕变和承继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一个人物的行动检验另一个人物的思想,解构人物思想的悖论,从而宣扬其倡导的真理。

1 思想的先驱者

《地下室手记》中主人公为自己勾勒、编织一个虚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是英雄,是以头撞墙的挑战者、解构者。实际上,“他在作品中有两类对话者,一是“你们”,即直接听众,二是“他们”,即思想上的论敌,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Розенблюм 1981:242)。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怎么办》中依托女主人公薇拉的梦为人类搭建一个“水晶宫”般的理想国,试图用“水晶宫”图解生活,用科学理性阐释人性。他的思想倡导理性,使人的自由成为虚幻的空中楼阁。

在某种层面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是对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新功利主义的反拨。“作者不是将地下室人视为叙述客体而是主体,赋予其逻辑与激情。”(Трубецкой 1995:695)他在给赫尔岑的信中曾经这样写道“我发现,科学的最终发展形式就是迫使我们去接受某种真理,无视我们愿不愿意接受”(Бочаров 2007:163)。于是,他通过地下室人的自白提出并探讨理性与个性、科学与意志之间的冲突,揭示科学无法复制人类本质的弊端。地下室人大声宣告,“我决不会把鸡舍当做宫殿。水晶大厦是胡吹瞎扯的事,按照自然规律它本不该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 1998:102)。在一般人的观念中,理性代表主流意识形态,是秩序、逻辑、规律的象征。在理性与个人意志对比中,理性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地下室人偏偏要颠覆这一权威,对一系列理性的逻辑进行诘问:当理性遭遇生活本身,用理性规律、科学逻辑、统计学方法是否能够丈量、计算生活的现实与真理;理性是否有权占据最高的统治地位;(劳特 2005:54)规律和公式是否能制约生活发展。地下室人对这一切都持断然否定态度“二二得四能有什么个人意志可言呢?二二得四已不是生活,那是死亡的开始。二二得四是个很高的东西,但二二得五有时候更可爱”(劳特 2005:99)。他试图打破所有的理性和逻辑,“水晶宫”就是一堵堵由信奉理性乌托邦真理的人们搭筑起的石墙,隔绝人类正常的感觉,是压抑人个性、约束人自由的理性象征。在它的阻隔之下,人们失去独立见解,受文明

规则、冰冷逻辑制约。因此,按照理性方式生活,势必失去自由与个性。

地下室人试图击碎、摧毁这堵石墙代表的自然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迈进,但他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场个人与全体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里,他形单影只、微不足道。然而,“力不从心”并不意味着屈从。面对“正常人”的反驳与质疑,地下室人选择以脱离道德规范和文明准则的方式回击“全体”。因此,他以其近乎病态的呐喊、牙痛般的呻吟反击这一理性世界,在长时间与理性世界抗争的征途中他遭到刻意排挤、肆意嘲笑、羞耻侮辱,而他反而在其中体验着“全体”中的人们无法理解的快感,因为“遭到的屈辱、轻视越多,他离朝思暮想的目的也就越接近,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离开规律、原则对人统治的迷宫”(舍斯托夫 2004:38)。因为承受这一切本身就是对抗的一种形式,是以“一”对“多”的一条必由之路,承受的屈辱越多,则代表着反抗的程度越深。

“合理的利己主义”也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一项重要理论,即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天性。如果谋求个人利益既不损害他人,又能造福更多人,那么人追求利益就合理。地下室人同样提出质疑,人类能否自觉将意志和利益结合起来从而避免犯罪。他认为,人并不是机器,有时偏偏想去违反自身利益而选择遵从意愿,而这种利益也无法按照科学的方法归类,更无法依托理论体系建构“人总喜欢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全然不是按照理智和利益所驱使的那样;他可能想去违反自身的利益。自己个人的、随心所欲的、自由意愿的、哪怕最怪异的任性,这一切才是那被疏漏掉的、最有利可图的利益”(舍斯托夫 2004:92)。地下室人认为,人的独立意愿比任何“有利可图”的利益都更加珍贵,他随时准备为此抛弃一切荣誉、安宁与幸福。实际上,所有对利益的牺牲都是为了捍卫个性,保留任性的权利。“自己的任性可能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真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更有利。甚至于在它给我们带来明显的损失并与我们的理性关于利益的最正确的结论相对立的情况下,它也能比一切利益更有利,因为至少它为我们保留了最主要的和最宝贵的东西,即我们的人格和个性。”(舍斯托夫 2004:94)他赞美的正是这种不受任何限制的、非理性的任性。可见,在地下室人颠覆理性与乌托邦的“水晶宫”的呐喊中,传达出对自由和个性的强烈渴求。他“故意恣意妄为,变得疯疯癫癫,因为他不愿忍受不自由”(劳特 2005:52)。他以不讨人喜欢的形象自居,向周围所有的人凶狠地呲牙吐舌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是自由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揭示自由、个性、意志与科学、统计学以及理性主义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地下室人无法忍受摒弃人的个性、夺走人的自由的一切,

在他看来,这是侮辱人的尊严。即使须要忍受痛苦和折磨,即使须要用灾难和不幸换取,他仍不愿放弃,因为其内心深处并不畏惧承受苦难。真正的痛苦可以使人严肃地思考生活,反思自我,认识光明的意义,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生活,改变生活。

2 同貌人的内在同源性与显性差异

《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用自己真实的行动演绎地下室人的理论“从《罪与罚》的善恶观念和它所展露的犯罪心理过程,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学的大概,从理论形态来看,它肇端于《地下室手记》的第一部《地下室》”(胡日佳 1999: 599)。在分析拉斯科尔尼科夫将地下室人的理论付诸实践之前,有必要梳理二者的同源性和差异性。

首先,地下室人和拉斯科尔尼科夫都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都生活在封闭的空间里,他们尽管厌恶陋室,却不想走出去。”(Киселев 1980: 251)他们一个生活在地下,一个生活在狭小的棺材似的房间里。地下室人在其中开拓超越一般规范的新视野,拉斯科尔尼科夫则建构自己的“超人”理论,狭小的居住空间还象征着他们封闭的内心世界。当地下室人试图走出地下室接触外界时,他遭遇的是悲剧与灾难,于是,他再次回到形单影只的梦幻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似乎觉得自己是个英雄。“长时间置身于地下室就如同置身于地狱,使主人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隔绝。对于他说,营造否定、解构的氛围只有一种可能,那便是拒绝与他人进行知识、情感、精神交流,沉浸于自己阴暗内心迷宫的研究之中。”(Бачинин 2001: 185)拉斯科尔尼科夫剪断同所有人的联系,尽管二者都不愿意,也不善于同外界接触,但他们都是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在学识和智力上明显优越于周围人。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是完全特殊的、分裂的、漂泊的,与现实不调和的,向往未来更好的、更加公道的生活”(田全金 2010: 293)。这段话充分概括了二者的个人主义特征。他们这种封闭、隔绝的状态将自己同所有人和社会对立。地下室人始终处于与“全体”与同学、同事、仆人、丽莎对立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则处于与“普通人”的对立之中。他们只承认自我意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自己身上。有时,为了实现某种夙愿,他们会走向极端,不计后果。

然而,离群索居的根源到底是优越感还是自卑感主要体现在:一个人是否害怕成为笑料。对此,地下室人与拉斯科尔尼科夫展现的心理活动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地下室人虽意欲将所有人排斥在外,但随时关注他人的评价。“地下室人想的最多的就是别人怎么看他。竭力揣摩别人对他的评价,猜测别人评语的意思和口气。”(Бахтин 1972: 466)因为别人的意见是揭示自我心理的必要条件和以第

一人称建构文本的理由“没有读者,没有对手,他便无法存在,当没有对话者的时候,他便须要假想一个,以便达到论辩的效果”(Ломинадзе 2001: 52)。这是一种敏感、病态的恐惧,是自尊心怕受到伤害而产生的心理戒备。他力图避开可能损害其人格的一切,反过来意欲贬低、压制他人。他意识到“自身的无能为力,所有的屈辱、怨恨和对无助的愤懑都使他感到痛苦。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它发泄到别人身上”(琼斯 2011: 83)。因此,他故意对别人摆出不屑一顾的姿态,以近乎夸张的癫狂宣扬独立意志、任性、个性自由,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怕成为笑料的恐惧。他虽然十分在意别人的评价,但从来不接受这些评价。从《地下室手记》到《罪与罚》,小说的叙述者由第一人称的“我”转变为第三人称,地下室人最喜欢用的一个词是“先生们”,即指向“全体”,而拉斯科尔尼科夫则用“你”,这是一种指向内心世界的叙述视角。巴赫金研究表明,《罪与罚》中的绝大部分篇幅都用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内心独白,展现为一种“高度的内心对话性”,与地下室人不同,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内心独白里也有与他人的交锋,但很少关注他人话语,很少猜测、揣摩他人心理,其重心并非建构在他人意识的关照或评价之上,而是通过自我评价、自我剖析将所有的思想都积郁在内心。因此,拉斯科尔尼科夫更加自我,更敢于“行动”。在举起斧头之前,他被自己的那个大胆的想法困扰着,举起斧头之后更是承受着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是非凡的人。

其次,二者身上都体现善恶同体的人类本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习惯“把人置于绝对条件下接受精神的试验,想弄清楚为什么人的内心存在着灵与肉、善与恶的斗争,两者是如何斗争的”(刘银 2011: 121)。他能够感受一切美的事物,但却被囚禁在恶中无法自拔,拉斯科尔尼科夫甚至试图通过犯罪达到善的结果。但同时,二者的道德意识都相对淡漠,他们冷漠、麻木,对周围的人与社会充满敌意。地下室人首先埋下恶的种子,认为为了独立意志、个性自由可以抛弃道德。在其热情洋溢的话语感染下准备开始新生活的丽莎,最后遭到其恶意的贬损、挖苦,陷入更沉重的痛苦与灾难中。地下室人毫不掩饰地彰显其人性恶的一面,试图用恶、用破坏性活动宣泄怨恨,反抗世界。同样,拉斯科尔尼科夫“几乎不带感情、机械地采取行动”,他在超人理论指导下残忍地举起斧头。地下室人与拉斯科尔尼科夫都挑战岿然不动的道德原则,以非理性的疯狂见证人的个性与自由。

最后,实际上二者都是伪英雄的化身。他们都认为“有责任、有义务站在高山之巅,指导庸众走出迷惘”(田全金 2010: 292),使人们摆脱对自身存在毫无知觉、麻木不仁的状态。地下室人痛恨人们无力反抗的懦弱,竭尽全力宣称自己已经独立于自然法则“他认为自己很特

别,但别人都把他当做苍蝇。他3次试图成为英雄(军官、同班同学、丽莎),但都以失败告终,他并不是英雄,甚至远非自己命运的主宰”(Назирова 1971: 148)。拉斯科尔尼科夫始终把自己塑造成一名“非凡的超人”,为了崇高而伟大的目的不惜践踏道德底线。如此,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辩证法就与地下室人的思想趋向一致。为了争取自由,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奋不顾身。然而,拉斯科尔尼科夫显然无法轻松地抛弃道德戒律,成为新道德法规的肇端者。因此,他不过是一名与他人无异的普通人。

3 以行动的悖论见证思想的真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罪与罚》在《地下室手记》停止的地方起步,后者的结尾处写道“这位奇谈怪论者的《手记》并没有到此结束”。地下室人在发表自己的理论时亢奋而又激昂,然而却无力将理论付诸实践。在思想上,他是自尊高傲与自轻自贱的矛盾混合体。一方面,他似乎故意丑化自己的外表,从而彰显其智力超群,不向任何人妥协;另一方面,在与别人面对面的交锋中,又表现得卑微、胆怯,甚至可笑。地下室人置身于一个充满屈辱的环境中,却把自己的个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形成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他感到最痛苦的是,他意识到自己的个性,同时又被置于不仅不能显示其个性,反而每一步都会遭到无数的接连不断的屈辱的环境中”(苏畅 杨依柳 2009: 5)。地下室人只能以思想代替行动,他进行的充其量是精神犯罪,但在其深层意识中已经有了“超人”思想的萌芽。他坦承自己“在内心深处是一个暴君”,试图无限制地对其唯一的朋友发号施令,似乎只是为了“战胜他,使他服从自己”(苏畅 杨依柳 2009: 133),展现其渴望控制他人的欲望。他的超人特质主要指在心灵感觉上属“最优的人”,还未涉及权力或强力意志。(胡日佳 1999: 597)然而,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理论,与尼采哲学开始呼应,他以否定形式实践地下室人挑战的抽象理性,用真实例子见证地下室人宣扬的自由与个性理论的界限。

地下室人提出科学就意味着生活的机械化和死亡的开始。理性消弭人的个性,使人变成一架机器,“理性代替本能行使自己的权利,正是它创立了科学。信奉理性生活秩序的人,将不是在感觉、本能或良心的影响下行事,而是以理性及其合法的命令为唯一的出发点:这样的人,如果他忠实于科学,就会不动声色地杀人,并且干得堂堂正正,根本无须感觉的参与”(胡日佳 1999: 52)。拉斯科尔尼科夫似乎就是这样的人,其行动在某种意义上归咎于其按照科学理论、理性、数学等逻辑思考问题,以此作为行动依据。他认为按照自然规律人可以分为平凡人与不平凡人,前者只是泛指同类材料,后者都是有天赋的人或天才,有权让自己越过良心这道障碍去破坏,不惜流血。“牛顿和开普勒为了让人类知道他们的发现,可以

牺牲1个、10个、100个人的生命。”(胡日佳 1999: 230)拉斯科尔尼科夫以不掺杂感性、伦理的方式,用看似符合自然规律的理论对人类进行分类,试图运用“超人理论”、“牛顿法则”处理人类生活。莉莎克纳普认为,“此行为旨在把新兴社会科学理论理性地应用于人类生活之中”(莉莎 2003: 74)。然而,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行为恰恰验证了过度依赖理论和理性,遵从所谓自然法则导致的不堪后果。地下室人坚决反对人顶礼膜拜自然法则(自然规律:“只需揭示自然法则,人就将不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将生活得非常轻松。不言而喻,到那时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将根据这些规律,用类似对数表的数学方法计算出来”(莉莎 2003: 90)。拉斯科尔尼科夫以悖论形式展现理性的冰冷与残酷。

拉斯科尔尼科夫用数学方法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与千百个人利益之间的价值差异。“杀死她,拿走她的钱,为的是以后用这些钱为全人类服务,为大众谋福利:舍弃一个人的性命,成千上万的人就可以得救。一个人的死换来成千上万的生——这不就是数学吗!”(莉莎 2003: 57)在他看来,一小于一百,这是一道再简单不过的数学题,他用数学逻辑代替传统道德伦理,颠覆道德体系。然而,人的生命能用数学计算吗?能用理性衡量吗?显然,算术不能应用到人性上。即使最卑微的生命也有价值,数学是摧毁生命的反动力量。在《地下室手记》的自白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及数学与生活、生命对立时,只是以隐喻方式阐释。但当他把拉斯科尔尼科夫“置于数学推理的支配下,使其毁灭另一个人的生命时,隐喻就成了现实”(莉莎 2003: 71)。生活无法用数学计算,不能完全依靠理性把握。看似合乎逻辑的科学规律却赤裸裸地显露可怕的弊端与悖论,生活会轻易地推翻、击垮它们。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地下室手记》提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人是具有个性的复杂个体,拉斯科尔尼科夫走上这条自由道路,将理论延伸到极致。“然而,人的良心超越道德规范,便不再是自由范畴,而是自我意志的范畴。”(Юрий 1980: 241)因此,当拉斯科尔尼科夫越过自由界限,将自由转化为跨越道德底限的恣意妄为,其悲剧便产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自由的存在,但是又意识到它的局限,无论如何也不同意绝对自由的思想。人应该以自觉的方式在善恶之间进行道德选择,从而权衡自由的界限。

4 结束语

《地下室手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创作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是作家后来许多作品的滋养源,贯穿于其后期诸多重要作品中的“犯罪”与“拯救”等重要主题均植根于前者提出的问题。在地下室人看来,仅仅按照理性方式生存是不完美的,他在结尾处提出“廉价的幸福

还是崇高的苦难,哪一个更好?”(陀思妥耶夫斯基 1998: 195)。从他最终对待妓女丽莎的非理性行为来看,他显然选择后者,即使要承受此生最沉重的痛苦,也义无反顾。他的行为与理性无关,既不利己也不利人,只是试图用精神征服、折磨、蹂躏证明自己优越。拉斯科尔尼科夫虽然惯于用理性方式思考问题,但在理性背后实则蕴藏着对自由意志的无限渴望与贪恋。他的举动是在抽象理性思维指导下的非理性行为,是自由意志、权利意志的体现,是为了验证自身的伟大与自由。人害怕丧失自由,害怕个性贫乏。害怕失去按“活的灵魂”行事的能力,于是他们犯罪,因而违犯道德,是为了确定自由和自行其是的能力(劳特 2005: 91) 这是基于意志自由不受约束而表现出来的精神满足。

地下室人与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具有对话性的一对主人公形象,后者从地下室走出来,一方面,用行动实践前者抨击的科学与理性;另一方面,延伸前者走过的道路,摒弃道德自律,将其宣扬的自由意志、个性与权力延伸到极致,从而走向反面。“在《地下室手记》中,地下室人推论出不自由的恐怖结果;在《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得到了自由的恐怖结果。”(苏珊 2004: 56)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真实例子作为对《地下室手记》的回应,对理性发出诘问,通过思考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向人们揭示理性悖论,展现自由的界限以及道德抉择的意义。

参考文献

- 别尔嘉耶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胡日佳. 俄国与西方——审美叙事模式比较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赖因哈德·劳特. 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系统论述[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莉莎·克纳普. 根除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 刘 铨. 论梅列日科夫斯基小说创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J]. 外语学刊, 2011(6).
- 马尔科姆·琼斯. 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现实主义解读[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 单世联. “水晶宫”与现代文化的分裂——重思车尔尼雪

- 夫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争[J]. 外国文学评论, 2011(2).
- 舍斯托夫. 在约伯的天平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苏 畅 杨依柳.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评论史综述[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3).
- 苏珊·李·安德森. 陀思妥耶夫斯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田全金. 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M].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
- 陀思妥耶夫斯基. 罪与罚[M].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1.
- Бачинин В. А. Петербург — Москва — Петушки, или “Записки из подполья” как русский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жанр [J].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01(5).
- Бахтин М. М. *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M].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2.
- Бочаров С. Записка из подполья: музыкальный момент [J]. *Новый мир*, 2007(3).
- Ломинадзе С. Перечитывая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и Бахтина [J].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01(2).
- Киселева М. В. Превраще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в насекомое: отголоски “Человека из подполья”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Кафки и Музиля [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2(2).
- Назирова Р. Г. Об этической проблематике повести “Записки из подполья” [A].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его время* [С]. Л.: Наука, 1971.
- Розенблюм Л. М. *Творческие дневн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Z]. М.: Наука, 1981.
- Селезнев Ю.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J].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0(7).
- Трубецкой Н. С. О “Записках из подполья” и “Игроке” [A]. Трубецкой Н. С.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а. Язык* [С].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группа “Прогресс”, 1995.

收稿日期: 2013-10-11

【责任编辑 王松鹤】